



读懂中国经济

张军◎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读懂中国经济

张军◎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懂中国经济/张军著.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7. 1

ISBN 7-80087-970-4

I. 读... II. 张... III. 经济学—随笔—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2465 号

书 名: 读懂中国经济

著作责任者: 张 军

出版发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准书号: ISBN 7-80087-970-4/F·594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70×99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联系电话: (010) 68990692 68990625

购书热线: (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 址: <http://www.developress.com.cn>

电子邮件: fazhan@drc.gov.cn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1992年在复旦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1995年分别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US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CHINA）提供的奖学金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和华盛顿州立大学（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97年以来，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东京都立大学、韩国庆北国立大学、联合国大学经济发展研究院（UNU-WIDER）、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等地做访问研究员和客座教授，是中国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研究论文，是PROJECT-SYNDICATE、《经济观察报》、《上海证券报》等财经专栏作家。近年出版的著作有《中国的工业改革与经济增长：问题与解释》（2003）、《组织、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2004）和《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与中国的经济增长》（2005）等。



读懂中国经济

张军◎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责任编辑：彭志辉

封面设计：精英书装
010-6447718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 • 前言

PREFACE

出版自己记录下来的愉快的文字总是愉快的事情。自从我在北京的中信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4本经济学随笔《愉悦的思考》（2004年版）以后，我本来尝试着要改换自己休闲的方式，不是把难得的休闲时间多用于轻松的写作，而是给自己更多体质运动的机会。但是这样一个决定根本没有得到执行。

在过去10多年里，我总是把我的主要精力用于对当代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上面，但我也总是会不断地去写我的随笔。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与别人不同的是，我根本做不到按周甚至按天计算写作频度。

事实上，写随笔的这项爱好对我的最大贡献是让我保持了对周围事情的好奇心、敏感力和不停顿的思维运动。更重要的是，对周围小问题的思考常常帮助我发现了一些在正规的经济学研究上有意义的题目。比如，在印度的访问和观察让我对“为什么中国拥有了优良的基础设施？”这样的问题有了浓厚的兴趣，这个兴趣引导我关注了中国和印度的政府治理和分权模式，并在半年前开始了一项关于“分权竞争、政府治理与中国基础设施的投资决定”的实证研究（以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

实际上，就兴趣和好奇心而言，我的观察和思考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有眼前中国宏观经济过热现象的话题，也有对中国经济的一些主要问题的思考，尤其是对一些大问题的简单分析。这些简单

的分析和点评并不完全是那种思想火花般的，有很多其实是我所从事的基础研究成果的高度简约或者在经济学范畴之外的另一类写法。比如说，收在本书的一些关于经济增长的文字就是建立在我这些年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的。

我近年来对实证的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以此为视角，解释什么东西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等比较大的理论框架问题。我喜欢用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和“政府治理”等概念，试图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中国与印度的增长差异。

正是因为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方面，也因为我的这些经济随笔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关于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的点评与解释，所以最终我还是把本书的书名确定为《读懂中国经济》。为了阅读的方便，我把这些文章大体上进行了分类，分为“眼前想着的事”、“增长的方式”、“经济学思维”、“国家大事”、“经济学问”以及“演讲稿”等。但从总体上说，这些文字都是我近来阅读中国经济这部“大书”的过程中记录下来的一些感想与观察，不妨把这些文字看成我从事中国经济研究过程的一个脚注。

有意思的是，每一次我推出的新的经济随笔都是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的。这一次中国发展出版社为了本书的出版及装帧设计花费了许多心思，我希望我的这本随笔的出版和“市场业绩”能够足以回报出版社的这些辛劳。但我与出版社之间在如何更好地“生产”这个“产品”上花费了比考虑它的“流通”问题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这不是因为对读者负责和精神上的快乐，那我们就显得非常不“理性”了。

每次最后我都要感谢我的太太和儿子给予我的爱和精神支持，这并不是“重复建设”的话。这些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越来越能体会到拥有一个“大家庭”的重要性。

张 军

2006年8月29日夜于美国西雅图

2006年11月23日夜修改于上海

眼前想着的事

治理危机还是统计危机	3
公路边的树为什么能长大长高	7
通货膨胀是怎么离去的	10
增长越来越真实	13
中国为什么拥有一流的基础设施	16
增长的分歧	20
该压什么样的投资	24
谁来“规划”政治资源的分配	28
聪明的政府和吵闹的经济学家	34
如何看待经济发展中的消费因素	37
为了和谐，我们需要更多的市场治理	40
高房价是被识别出来的	44
巧合的“12”周期现象	46

增长的方式

经济增长的故事 (1)	51
经济增长的故事 (2)	54

经济增长的故事 (3)	57
经济增长的故事 (4)	60
还需读懂中国经济这一课	63
转型与增长：关注中国经验	66
把谁的激励搞对	72
印度和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	77
印度的经济增长是另类的吗	82
芬兰的体制转型与经济奇迹	87
增长的困局	91
我又想起了熊彼特.....	94
迷失在亚洲增长	98
关注中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102

经济学思维

世界不被颠倒的逻辑	107
“中国创造”：经济学家为什么更冷静	109
有时候我们是需要老板的	113
“草根”为何成大器	116

谁是企业家	119
在商学院挑战管理者思维	122
创业与教育	126
再议我们为什么缺乏创新	129
科技起飞与经济发展：中国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	132
中国公司为什么想到美国投资	137

国家大事

挑战中国汇率的是什么	143
中国经济该怎么走	146
该到管理货币的时候了	149
谁来支付银行重组的代价	152
不要把“绿色 GDP”数字化	155
中国进一步的经济改革越来越需要吸纳 技术性知识	158
把经济发展泛政治化是危险的	162
股权分置改革为什么还没有带来中国证券 市场的繁荣	165

产业重组有助于激活存量投资需求	167
中国需要加快结构性改革的步伐	170
从“全能政府”到“界面政府”： 加快长三角经济的协整	173

经济学问

经济学是这样成为经验科学的	179
印象五常吾师	184
主流经济学家	187
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教育	190
深化现代经济学教育是经济改革少走弯路的 重要保证	194
十年轮回：诺奖回归博弈论	198

演讲稿

为什么治理经济“过热”重在治理银行	207
“经济解释”也是一连串的事情	216
中国经济发展：为增长而竞争	225

眼前想着的事



- ◎ 治理危机还是统计危机
- ◎ 公路边的树为什么能长大长高
- ◎ 通货膨胀是怎么离去的
- ◎ 增长越来越真实
- ◎ 中国为什么拥有一流的基础设施
- ◎ 增长的分歧
- ◎ 该压什么样的投资
- ◎ 谁来“规划”政治资源的分配
- ◎ 聪明的政府和吵闹的经济学家
- ◎ 如何看待经济发展中的消费因素
- ◎ 为了和谐，我们需要更多的市场治理
- ◎ 高房价是被识别出来的
- ◎ 巧合的“12”周期现象



治理危机还是统计危机

我一直忙于自己的研究工作，周末时终于决定外出休息两天，去了苏南的几个地方，也见了几位地方的官员。在这个时候与地方官员见面，我们的话题总是关于宏观经济的。中央曾为了稳定宏观经济召开了最高规格的“电话会议”，要求所有省市的一、二把手必须到场参加。顿时间提升了一直在学术界和媒体上讨论热烈的投资膨胀问题的严重性和严肃性。外界很容易就看得出，电话会议针对了地方政府的态度和他们持续高涨的投资规模。这种性质的电话会议毫无疑问会给地方官员明显地带来政治上的压力。难道应该把组织这样的电话会议理解成 1994 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最直接的治理危机的信号？

也许问题还不至于这么严重。但我在苏南的两天却让我不得不关注另外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我们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数据？从苏南我见到的两位地方官员的口中，我能感觉到地方政府存在着的一个基本的疑虑或尴尬：中央政府掌握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是否足以对宏观经济的过热与否做出可信的判断？其实从上一次的情况来看，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数据似乎并不完全获得地方政府的认同。但问题是，这个数据又都来自地方。假如连地方政府都不太认可这个投资规模的数据，那么真正的危机就不是治理危机而该是统计置信的危机了。

关于中国的总量统计数据是否失真，早已不是一个新的话题。

但是过去十多年来，人们关注的统计误差问题还主要集中在 GDP 及其增长率这个数字上，对其他统计指标的关注和议论较少。2005 年年底国家统计局初步公开了 2005 年全国经济普查的结果。它提醒我们，中国的 GDP 数据可能近十年来被低估了。2004 年的 GDP 数据被上调了 17%。因为 GDP 的数据被低估了，那么衡量经济稳健程度的一些重要指标，特别是那些以 GDP 为分母的指标自然就被夸大了。这意味着投资率以及服务业的比重等指标就需要进行比较大的修正。如果按照调整后的 GDP 数据来计算，中国 2005 年的投资率约为 40% 多一点而不是 50%。

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及投资的增长率历来成为我们估计经济是否过热的最主要的指标。它的统计口径和范围是否合理，数据是否真实，当然就格外重要。但是我们对这项统计数据的研究和讨论却出奇的少。三年前发生在经济学家内部的那一次对经济过热的判断分歧就已经提醒了我们，投资规模等统计数据可能存在过大的偏误。不然的话，投资规模这般地增长下去，岂不很快使我们的经济崩溃？哪还有不发生严重通货膨胀之理？在这之后，我们没有特别认真对待投资规模本身的这个统计问题。这些年来在公开场合很少有经济学家对投资规模等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和合理性提出质疑。

那么，是否有理由怀疑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有被严重高估的可能呢？从一般的经验而言，固定资产投资相对于 GDP 的规模很少会在 40% 以上。在战后的新兴工业化经济里，只有新加坡的投资规模达到过 40%，但新加坡的经济学家前两年发表研究论文发现，新加坡曾经达到的这么高的投资率主要是因为房屋建设时期的投资规模造成的，制造业领域的投资规模和其他工业化经济相比仍然是比较合理的。中国的投资率这些年来持续上升，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突破 40% 之后 2005 年很快达到 50% 的水平。有经济学家前不久说过，这个比重还会上升，甚至会超过 70%。这样的判断其理论依据是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我确信没有理论让我相信这个趋势会发生，也没有理论可以解释这个比重持续上升的可能性。相反，

对任何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来说，如果可以相信投资需求的投资可以持续保持 GDP 增长率的 3 倍甚至更多，如果可以相信 GDP 的一半甚至更多可以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的话，崩溃的如果不是这个经济，那一定是这个经济学家自己。

经济学家需要的是冷静的分析与研究。瑞银华宝（UBS）亚洲研究部的经济学家安德森博士曾经发表文章称，投资额被高估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现象。我想他是对的。与 GDP 的统计不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们的政府对那些创造 GDP 的经济活动的掌控范围的确很有限，虽有被夸大的可能，但一定会有遗漏，而对投融资金额数字的来源渠道和追踪则非常全面。各级地方政府手上掌控着对投融资的全面数据，在层层上报时不会遗漏，只会夸大。因为从政治上来说，投资规模总是度量 GDP 和政绩的重要标尺，投资额的数据被高估也就在所难免。

除了存在夸大高估的趋势之外，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还有其他统计上的问题。坦率地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口径和范围过于宽广，过于复杂。很难想象地方政府在收集和加总投资规模的数据上是如何把握分寸，做到准确和合理的。混淆投资和消费是十分容易的。哪些不应该计算在固定资产投资的当年数据中？哪些要算进来？在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领域，土地开发的费用如何估计和计算？是否应该把购置土地的费用计算进来？等等。这些问题在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那里很难做到概念清楚和统计准确。很大一部分所谓的固定资产投资往往是用“交易额”数据而不是投资额数据来估计的。而且，在地方政府那里，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是依赖项目的计划数来粗略推算，不可能等到实际发生额出来之后再统计。

当然不能忽视的还有一个价格变化的因素。其实，我几年前发表在美国《亚洲经济学杂志》（JAE）上的一篇文章就曾发现，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扣除投资品的价格变化的因素的话，中国的投资规模占 GDP 的实际比重的变化就温和得多了。事实上，我们现在公布的投资率的统计数据都是没有“挤压”掉价格变化因素的

“名义”比率而不是实际比率。特别是这些年来当土地、基础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持续走高的时候，投资品的价格指数上升的一定比GDP的价格指数快得多。这样的话，投资占GDP的名义比率持续和快速地上升就可以理解了。而简单地以这个名义比率来判断宏观经济的过热与否就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我在苏南发现，地方官员对投资数据中存在的以上这些问题是认可的。但是他们同样明白的是，这样加总得到的固定资产规模的统计数据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当地制造业企业的投资状况。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说出许多理由来，说明他们自己对上报的投资数据的真实性是不怎么有信心的。与地方政府官员一样，对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持怀疑态度的还有一些境外的投资银行机构。例如，UBS使用自己编制的建筑业指数而不用中国的房地产投资额的数据来判断房地产的繁荣状况。实际上，为了更有意义地统计当年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一个国际上通行的统计方式是获得公司层面的资本支出的数据，并用这个数据来推算当年总的固定资产规模。这样的做法对于更准确地把握宏观经济的走势也许更合理，而做到这个接轨好像并不难。

2006年7月31日